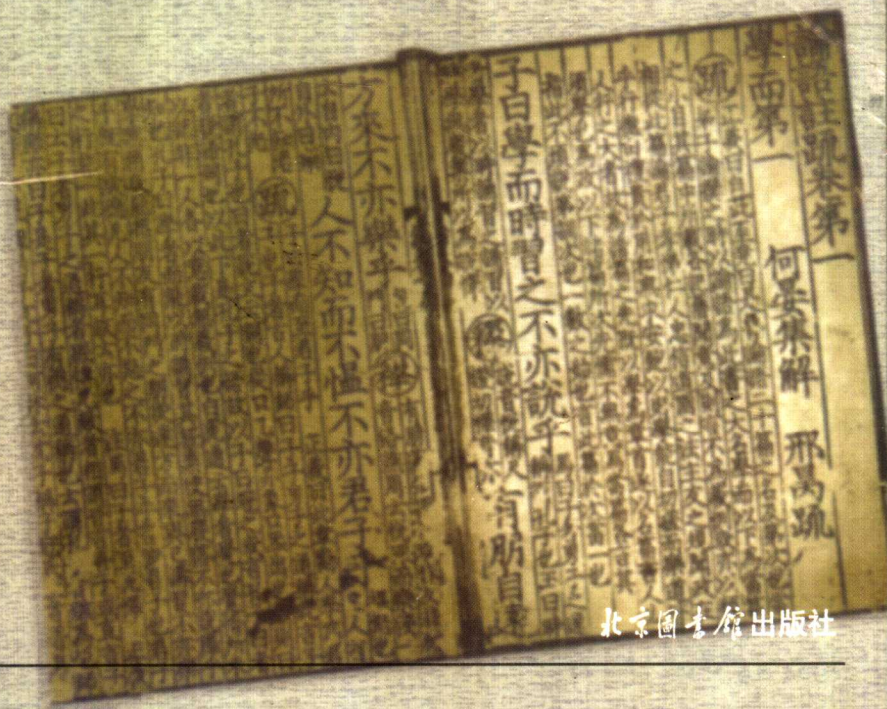


诸子著作

年代考

(香港) 郑良树 著



北京圖書館出版社

诸子著作

年代考

(香港) 郑良树 著

13. 19
ZLS

北京图书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诸子著作年代考 / (香港) 郑良树著. — 北京: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, 2001. 9

ISBN 7-5013-1804-2

I. 古… II. 郑… III. 古籍-年代-考证 N. G256. 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32419 号

书 名 诸子著作年代考

著 者 (香港) 郑良树

出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(100034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 7 号)

发行 (010) 66126153 传真 (010) 66174391

E-mail Btsfxb @ publicf. nlc. gov. cn

经销 新华书店

印刷 北京三木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850×1168 (毫米) 1/32

印张 8.75

版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 218 (千字)

印数 1—3000

书号 ISBN 7-5013-1804-2/K · 341

定价 14.00 元

目 录

论古籍辨伪的名称及其意义（代序）	（1）
《金人铭》与《老子》	（12）
论《晏子春秋》的编写及成书过程	（21）
孙子军事思想的继承和创新	（58）
论兵家的起源及其学术领域的开拓	（76）
从重文的关系，论《列子·黄帝》的流传	（90）
论《列子·汤问》的成篇时代	（112）
从重文的关系，论《列子·说符》的流传	（129）
《列子》真伪考述评	（149）
《列子》成书时代研究管窥	（183）
近代学者《尉繚子》争论述评	（195）
论《公孙龙子·迹府》的成书时代	（219）
《荀子·非十二子》“子思·孟轲”条非附益辨	（228）
《韩非子》研究的回顾	（239）
论《孔丛子·诘墨》的写作背景及成书时代	（252）
疑古与复古——论古籍辨伪的方向	（265）
后 记	（276）

论古籍辨伪的名称及其意义

（代序）

郑良树

在古代文献学中，古籍的真伪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课题。诚如梁任公所说的：“伪书足令从事研究的人扰乱迷惑……研究的基础先不稳固，往后的推论、结论，更不用说了。即如研究历史，当然凭藉事实，考求它的原因结果；假使根本没有这回事，考求的工夫岂非枉用？或者事实是有的，而真相则不然，考求的工夫亦属枉用。”^①古籍真伪不仅涉及古籍本身的问题，也影响架构上去的各种历史真相和理论思想等；如果古籍真伪不分，或者竟用上一些伪造的材料，那么，得到的结论岂非枉然。所以，姚际恒谓古籍真伪是“读书第一义”^②，诚非虚言。

在清代结束之前，研究古籍真伪的学者绝大部分都侧重于伪书的考订；即对传闻为“真”的古籍，经过考订及研究之后，判定其为伪书。整部古籍辨伪学史，绝大部分都是“真→伪”的研究，至少是以此为主流。对传闻为“伪”的古籍加以考订研究，然后判定为真著的情形，可以说绝少。试以明代宋濂《诸子辨》、胡应麟《四部正伪》及清季姚际恒《古今伪书考》为例，许多宋、胡认为“真”或“真杂以伪”的古籍，到了姚的手中，都无不变为伪书了；然而，我们就看不到宋、胡认为“伪”的古籍，被姚改判为真书的例子。再看张心澂编的《伪书通考》，卷前《例言》说：

明清三家对子部古籍真伪的看法

子部（部分）	《诸子辨》	《四部正伪》	《古今伪书考》
《鶡冠子》	真	伪杂以真	伪
《列子》	后人荟萃而成	真杂以伪	伪
《鬼谷子》	真	伪	伪
《孙子》	真	无可疑	未知谁作
《吴子》	真	战国人编成	伪
《尉繚子》	真	无可疑	伪
《商子》	真		伪
《公孙龙子》	真		伪
《孔丛子》	伪	真疑伪	伪
《文中子》	伪	真伪相杂	伪
《慎子》	真		伪

一、凡一书之全部分或一部分为伪造及发生伪造之疑问者，均列入。

二、凡书本非伪，因误认撰人及时代，照所误认之撰人及时代论，即成伪书者，故亦列入。

根据这两条《例言》来观察，书内搜罗的都是“真→伪”的考订文字了。《例言》第五条说：“每一书之下，凡古今人对此书辨伪之说，均为列入；如有驳议，及辨其不伪，或批评他人之所辨者，亦均列入。”表面上看起来，似乎是“伪→真”的考订，实际上并不然；那是“真→伪”的研究过程中，有人提出反对，认为“不伪”，或有不同的看法，“批评他人”及“驳议”，对“真”、“伪”无法下最后的判决而已。《通考》所录的，绝大部分都是上述两种情形的考订文字。

因此，当曹养吾在上个世纪 20 年代为这门学问安上名号时，

自然就拟出“辨伪学”^③三个字了。他说：

通常认辨伪的工作是对古书而发的；其实，这句话至多对了一半。……老实说，辨伪的工作是随地有用的。能怀疑，能辨诘，便是能读书。我们只要知道古今载籍都不是圣经贤典，我们便该存一个疑问——怀疑的诘问——在我们心上。从他叙述这门学问的研究范畴及研究精神来看，安上这个名号当然很恰当了。

笔者在 80 年代就曾经提出，“古籍辨伪”是个十分不理想的名称。一部传闻为“真”的古籍，经后人考订，有可能被判为“伪”；相反的，一部被认为“伪”的古籍，经后人研究，也可能恢复其“真”的身份；因此，古籍辨伪学实际上应该包含来往的两条研究路线，不但要研究“真”书，也要考订“伪”书，是一门“真 $\leftrightarrow$ 伪”双轨同时进行的学问^④。如今，这门学问被安上“辨伪学”，让人觉得只研究“真 $\rightarrow$ 伪”，并不研究“伪 $\rightarrow$ 真”，变成单轨的学问，与双轨同时进行的意旨不合了。随着竹简帛书的出土，这个名称更显得不恰当。

就古籍辨伪而言，竹简帛书出土所带来的震撼，恐怕与古史辨学派新说的震撼不相伯仲；因为古史辨学派为古籍真伪带来“石破天惊”的新说，而竹简帛书却为这些新说带来“冷酷无情”的否决，尽管这些否决不是全面的。在竹简帛书严峻的考验下，许多被过去学者判定为伪造的古籍，都纷纷平反翻身；底下举数例加以说明：

（一）《晏子春秋》

自柳宗元提出“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”的看法后，本书就开始被列为伪作。清代管同甚至怀疑为“六朝人为之者”，梁启超则将其依托年代订在汉初。银雀山竹简本《晏子》出土以后，证明管、梁的说法都不能成立，本书“成书年代最晚不会晚于秦统一六国，从书中的内容及语言用字来看，很可能还会更早一

些”^③。

（二）《孙子兵法》

陈振孙和叶适因为《左传》无孙武其人，开始怀疑本书为伪作。有清一代，除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^④及孙星衍^⑤维持旧说外，各家都提出反面的意见，或否定十三篇，或否定孙武其人。到了近代，金德建及钱宾四先生更认为是孙臆的作品。竹简本《孙子》及《孙臆兵法》的出土，不但说明俩人各有著作，也证明本书不伪^⑥。

（三）《鹞冠子》

自柳宗元以下，皆认为本书“尽鄙浅言”^⑦，“为后人伪托”^⑧。随着帛书《老子》卷前《黄帝四经》的出土，许多学者如侯外庐、张岱年、李学勤及吴光等^⑨，对本书的真伪纷纷重新思考；吴光甚至在他的论文内辟有《辨真的分析》一节，深入讨论其真伪，结论是：“除《世兵》、《世贤》、《武灵王》三篇可能是《庞煖》书混入之外，其余十六篇则是《鹞冠子》原书。”

（三）《尉繚子》

姚际恒认为首篇《天官》“全仿《孟子》‘天时不如地利’章为说”，“其伪昭然”；^⑩姚鼐认为“盖后人杂取苟以成书而已”^⑪；都判为伪书。银雀山汉墓出土《尉繚子》残卷，与今本相同者有六篇；根据何法周及笔者的研究^⑫，本书当是梁惠王时的尉繚所著，非后人所能伪托。

（四）《文子》

过去学者大部分都认为本书为伪托，或真杂以伪。上世纪70年代河北定县汉墓出土竹简本《文子》，为本书的真伪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新资料。经过研究之后，有的学者认为是成书于《淮南子》之前的“先秦古籍之一”^⑬，有的学者则认为成书于西汉初年^⑭；说它是后人伪造的，恐非事实。

(五)《道德指归》

本书旧题西汉严遵著，然而，历代学者疑之者甚多，《四库提要》因书中“所引《庄子》，今本无者十七、六”，乃判定为“赝托”。晚近帛书出土，将本书和帛书相互参校，笔者发现本书与其他各本不同，而独与帛书及古籍引《老子》相合者有二十四处；如果本书乃伪托，单只比较《德经》部分，怎么会有如此多的相合呢？可见本书非伪书^⑦。

上举五例，不但足以说明竹简帛书严峻地考验了过去学者在辨伪上的成绩，也足以说明竹简帛书出土之后，这门学问不再只是“真→伪”单向的考订，而是包括许多“伪→真”另一方向的研究工作了。那么，“古籍辨伪学”的名号，岂不是很不相称吗？

近人朱碧莲于1987年编注有《宋玉辞赋译解》，1993年著有《楚辞论稿》^⑧；二书都刊载了她所写的《宋玉辞赋真伪辨》，不过，对于宋赋的真伪却前后有不同的看法。在前书里，她认为宋赋真者有《风》、《高唐》、《神女》、《登徒子》及《对楚王》，伪的有《笛》、《大言》、《小言》、《讽》、《钓》及《舞》；到了1993年，经过研究，她认为除了《舞》，其他十篇全是真作，像这样的考订和研究，应该称为“辨真”，而不是“辨伪”了。

张西堂在抗战前撰有《穀梁真伪考》及《荀子真伪考》^⑨；在《荀子》各篇的考订上，他说：

在上文中我论定《荀子·劝学》等十四篇为真荀子文……《儒效》、《议兵》、《强国》三篇以及《成相》以下八篇，俱从旧说假定，亦无若何疑问。惟《荣辱》、《非相》、《君道》、《臣道》四篇之有几段疑为非荀文，《仲尼》、《致仕》、《君子》之疑为非荀文，这在过去虽有人也一样地怀疑过，但亦未有积极主张之者。兹篇所述，本为从严假定，目的在勿以伪乱真。

他将《荀子》逐篇考察，依各篇情况分辨其真伪，所以，称为

“真伪考”。既然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称为“真伪考”；那么，这门学问可称“古籍真伪学”吗？

何谓“真”？何谓“伪”？以今日观点来看，作者亲著者为真，相反者即称伪。然而，古人似乎没有这种“著作权”的观念。余嘉锡说^⑨：

古人著书，本无专集，往往随作数篇，即以行世……迨及暮年或其身后，乃聚而编次之。其编次也，或出于手定，或出于门弟子及其子孙，甚或迟至数十百年，乃由后人收拾丛残为之定著。

先秦古人著文，皆不书篇名及作者，随作随行，没有定规，后来编次成书，也不一定出于手定；既无“成一家之言”的意图，也无私家著作的版权观念。在编纂中，一些与作者生平行事相关的文字，或者他人之辩驳，或者作者平日的诵说而弟子熟闻而笔记之文录，以及门人附记的语录等，也都一概悉为编入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试问何谓“真”和“假”？我们可以将那些相关的篇章、文录、语录及笔记，甚至辩驳等，都打入伪书的行列吗？然则，真伪之辨还有意义吗？余嘉锡先生说^⑩：

自汉武以后，九流之学，多失其传。文士著书，强名诸子，既无门徒讲授，故其书皆手自削草，躬加撰集，盖自是而著述始专……后人习读汉以后书，又因《隋志》于古书皆题某人撰，妄求其人以实之，遂谓古人著书，亦如后世作文，必皆本人手著。于其中杂入后人之词者，辄指为伪作，而秦汉以上无完书矣。不知古人著述之体，正不如是也。

在此情形下，我们如何判定真伪的界限呢？

因此，笔者管见以为，“真伪考”及“真伪学”之名恐怕不符合古籍流传及编纂的实况，也无法清楚表达这门学问目前所要从事研究的实情及范畴。

古籍其实是一种有生命的机体，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，它们

是生机蓬勃，有增减的变化，也有衍生异化等的演变；即使已编纂“定型”的书，也不排除有第二及第三次编辑的可能，把初编所未曾搜入的材料，或者初编以后衍生出来的新材料再行纂集。

兹以《晏子春秋》为例，来说明这种现象。

《晏子》是一部相当复杂的古籍。构成本书最早的一批材料，其来源恐怕是多元的——多人多时多地所积累而成的，有的和《左传》的晏子材料各有源头，有的恐怕在《左传》之前，有的略晚于《左传》。自本书第一批材料编成及流传之后，就经常出现“新造”的篇章；所谓新造篇章，以目前所能看到的，很可能就是根据旧有的篇章，以加添、删节、拼凑、浅化及改写等衍生的方式，不断孳乳繁生，使有关晏子言行故事越来越丰富，越来越多；有的故事后来编入本书中，有的流传开来，被其他古籍采入^②。比如《晏子》书中下列四章：

一、《内·问》下第二十九章《梁丘据问晏子》

二、《外》第十九章《高子问》

三、《外》第三章《仲尼游齐》

四、《外》第四章《仲尼之齐》

这四章，都围绕着同一主题“一心事三君”来编写；最原始的应该是梁丘据（第一章）及高子（第二章）分别和晏子的答问，晏子答梁丘据简单，答高子就比较详细。接下来是仲尼游齐，误听晏子“事三君而顺”，以为晏子“一心事三君”，所以，只见景公，不见晏子（第三章），景公及子贡（第四章）于是分别对仲尼的行径表示疑惑。最后，经晏子或简要（第三章）或详细（第四章）地解释，才使孔子改观，或简（第一章）或详（第四章）地作出评议，并接见了晏子（第四章）。这四个故事，有互相穿插、交替采用、各自取舍的痕迹，一个一个编写出来，形成一个内容相近相同以及情节有时可以串连的故事串；而其来源恐怕是多元的——异时异地异人所编写。

举此一例，就可以知道本书不是“非齐人不能具其事，非墨子之徒则其言不若是”^②、“非晏所撰”^③、“其文浅薄过甚，其诸六朝后人之为者与”^④及“其依托年代似甚晚”^⑤等一两句话就可以说得清楚的。

《晏子》是如此，其他先秦古籍难道就不是如此吗？余先生说：“其编次也，或出于手定，或出于门弟子及其子孙，甚或迟至数十百年，乃由后人收拾丛残为之定著。”正是《晏子》及其他先秦古籍生机蓬勃地由异时异地异人编写而成的另一种说法。

讨论到这里，我们就可以发现，“古籍真伪考”及“古籍真伪学”这两个名词不但无法精确地反映研究的真情实况，而所谓“真著”及“伪托”这个时候也失去意义了。实际上，我们所想考订的，应该是古籍内个别篇章的作成时代及流传时代。正惟古籍都有漫长的流传过程，正惟古籍都是有生命的机体，所以，我们就个别篇章的作成及流传时代及传播情况加以考订研究，才能将古籍的真情实况说得准确。因此，笔者认为这门学问应当正名为“古籍时代学”，从事古籍这方面的研究则称作“古籍时代考”。

“古籍时代考”实际上并非一个新名词，有些学者不知不觉中已经采用了。比如李学勤先生的《帛书易传及系辞的年代》、《申论老子的年代》及《管子轻重篇的年代与思想》等^⑥；比如吴光在《鹖冠子非伪书考辨》中，有“鹖冠子的成书时代”一节；在《黄老帛书考辨》中，有“黄老帛书的成书时代”一节^⑦；笔者早期也用这个名词^⑧。

根据过去的经验来说，研究古籍真伪的工作比较侧重于“伪”的考索。古籍经肯定为“真”，这方面的研究似乎就可告一段落；若经鉴定为“伪”，则必须追查其作成及流传年代，不当就停在“伪”的阶段而已。梁任公民国初年撰有《古书真伪及其年代》，把“真伪”及“年代”并列一处；他说^⑨：

总之，中国古籍，许多全是假的，有些一部分假，一部

分真，有些年代弄错。研究中国学问，尤其是研究历史，先要考订资料，后再辨别时代，有了标准，功夫才不枉用，我所以把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作为一门功课讲，其用意在此。

依据梁任公的说法，古籍必须“先考订资料”，然后“再辨别时代”；换句话说，经考察后发现有无伪托的，乃进一步研究其作成年代，可见侧重点比较偏向于伪书方面的年代的研究。

古籍既然是有生命的机体，有新陈代谢的功能和现象，那么，就“伪”的部分来说，我们就很难指明什么时候出现的章节、篇章应该定为伪了。有的先秦古籍根本就无法断定哪一部分是“真著”；比如前举的《晏子》，学者说“成书年代最晚不会晚于秦统一六国，从书中的内容及语言用字来看，很可能还会更早一些”^①；即使如此，我们能称它是“真著”吗？那些比《左传》早的章节，就是“真著”吗？那些比《左传》迟的，就不可以当“真著”来看待吗？又比如《列子》，从战国到刘向，再到张湛，有一段很漫长的流传过程，也有一段很复杂的曲折；我们怎么辨认哪一部分是“真”？但是，谁又敢否定全书八篇中竟没有一些是列御寇的作品？在这样的情形下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撇开真伪的争论，找出各篇的时代先后；这是大家所能够接受的一个办法。过去学者所说的“伪托”，实际上还颇有空间让我们发挥，值得我们去探究。

既然改称“古籍时代考”、“古籍时代学”，那么，要研究的就不再只是全书的真伪，而是书中各节各篇成书时代的先后的问题了。古籍既然大部分是散装流传，随写随行，最后才将各种相关的材料汇集一处，实际上就等于一个学派的集体著作了，《管子》、《晏子》及《商君书》^②都应该作如是观，《列子》及《庄子》等书，又何尝不可作如是观呢？

[附注]

①见梁著《古书真伪及其年代》，第2页；台湾中华书局1963年第二版。

- ②姚际恒《古今伪书考》曰：“学者于此，真伪莫辨，而尚可谓之读书乎？是必取而明辨之，此读书第一义也。”
- ③曹撰有《辨伪学史》，原刊于1928年东吴大学《水荇》第一卷第一期内，后顾颉刚收入《古史辨》第二册内，见第388—415页。
- ④参见笔者所著《古籍辨伪学·自序》，台北学生书局1986年版。
- ⑤此乃骈宇騫《晏子春秋校释·序言》语，引文见第3页，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。
- ⑥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说：“武书为百代谈兵之祖，叶适以其人不见于《左传》，疑其书乃春秋末、战国初山林处士之所为。然《史记》载闾阎谓武曰：‘子之十三篇，吾尽观之矣。’则确为武所自著，非后人嫁名于武也。”（艺文印书馆影印本，第1954页上）
- ⑦孙曰：“诸子之文，皆由没世之后，门人小子撰述成书。惟此是其手定，且在《列》、《庄》、《孟》、《荀》之前，真古书也。”见《孙子略解叙》，在《岱南阁丛书》内。
- ⑧参见拙作《论孙子的作成时代》，在拙著《竹简帛书论文集》内，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。
- ⑨此乃柳宗元语，在柳著《辩鹖冠子》内，见《柳河东集》第四卷。
- ⑩此乃黄云眉语，在黄著《古今伪书考补证》，齐鲁书社1980年版，第152—156页。
- ⑪见侯外庐《中国思想史纲》，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；张岱年《中国哲学史史料学》，三联书店1982年版。李学勤说：“《鹖冠子》的年代比较清楚，它的上、下限连二十年都没有。因为很明显的是，庞煖死的年代是已知的，书中称呼他作‘庞子’，是庞煖学生的口吻，另外有些地方还避秦始皇的讳，可是一定也经过秦代。仔细考虑，这部书的时代不出战国的最后几年到秦代的焚书以前。”见李撰《走出“疑古时代”》，刊于《中国文化》，1992年11月第七期。吴光的意见参见《鹖冠子非伪书考辨》，在所著《古书考辨集》内，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初版。
- ⑫见姚著《古今伪书考》。
- ⑬见姚著《姚姬传全集》；张心澂《伪书通考》录其文。
- ⑭何撰有《尉繚子初探》，刊于《文物》，1977年第二期，第28—34页。笔者撰有《尉繚子的内容和类属》，在刘春生译注《尉繚子全译》中，贵州人

民出版社 1993 年版。

⑮此乃唐兰语，见文物出版社 1976 年出版《经法》中之《唐兰附记》。

⑯见吴光《文子新考》，在《古书考辨集》内。

⑰有关本书的考证，可参看拙作《论严遵及其道德指归》，在拙作《老子论集》内，台北世界书局 1983 年版。李学勤先生有《严遵指归考辨》，在《古代文献丛论》中，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6 年版；文末曰：“此书北宋尚全，南宋初已甚罕见。”

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。

⑲二书皆台北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1994 年版。引文见《荀子真伪考》第 153 页。

⑳余先生著有《古书通例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；引文见第 43 页及第 93 页。

㉑同上，第 119 页。

㉒有关这方面的考证，可参考拙作《论晏子春秋的编写及成书过程》，刊于《管子学刊》2000 年第一期、第二期内，山东齐文化研究院；已收入本书。

㉓此柳宗元语，同⑨。

㉔此《崇文总目》语；《伪书通考》亦录其文。

㉕此管同语，吴则虞《晏子春秋集释》《附录》录有其文，第 630—631 页，中华书局。

㉖此梁启超语，在《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》内，《伪书通考》录有其文。

㉗在李著《古代文献丛论》中，同⑰。

㉘在《古书考辨集》中。

㉙笔者早年写过《论孙子的作成时代》，在《竹简帛书论文集》中。

㉚引文见该书第 12—13 页。

㉛此骈字骞语，同⑤。

㉜笔者著有《商鞅及其学派》，台北学生书局 1987 年版；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。

《金人铭》与《老子》

《老子》五千言颇引圣贤语及古书语，作者并未明指其出处，所以，都属于暗引的性质。比如：

故建言有之：明道若昧……（四十一章）

故圣人云：我无为……（五十七章）

用兵有言：吾不敢为主而为客……（六十九章）

这些篇章，作者虽未明言其为引文，不过，就其写作方式来推测，应属于引文无疑；有的引自古书，如四十一章及六十九章；有的引古圣贤语，如五十七章^①。

另一种暗引情形就与此不同了。我们无法从其写作方式判断其为引文，必须通过与古籍文字相比勘对照，才知道其文字是前有所依据，属于暗引的一种。这里，我们要讨论《老子》以此暗引方式引录了一篇古代文献的部分文字的问题。

据古籍记载，古有《金人铭》其文；这则文字，首见于《说苑·敬慎》内，原文如下：

孔子之周，观于太庙右陛之前，有金人焉，三缄其口，而铭其背曰：古之慎言人也，戒之哉！戒之哉！无多言，多言多败；无多事，多事多患。安乐必戒，无行所悔。勿谓何伤，其祸将长。勿谓何害，其祸将大。勿谓何残，其祸将然。勿谓莫闻，天妖伺人。荧荧不灭，炎炎奈何。涓涓不壅，将成江河。绵绵不绝，将成网罗。青青不伐，将寻斧柯。诚不能慎之，祸之根也。口是何伤，祸之门也。强梁者不得其死，好

胜者必遇其敌。盗怨主人，民害其贵。君子知天下之不可盖也，故后之下之，使人慕之，执雌持下，莫能与之争者。人皆趋彼，我独守此。众人惑惑，我独不徙。内藏我知，不与人论技。我虽尊高，人莫我害。夫江河长百谷者，以其卑下也。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。戒之哉！戒之哉！

孔子顾谓弟子曰：“记之，此言虽鄙而中事情。《诗》曰……行身如此，岂以口遇祸哉。”

其后，《孔子家语》采入《观周》内。武内义雄^②及黄方刚^③已指出它与《老子》的关系。

在讨论《金人铭》与《老子》关系之前，我们先讨论《金人铭》的时代问题。

《金人铭》短短的百余字内，有两段文字与其他古籍重复。《大戴礼》卷六《武王践阼》引《席铭》及《楹铭》（以下分别简称《席》及《楹》），《席》曰：“安乐必敬，无行可悔。”《楹》曰：“毋曰胡残，其祸将然；毋曰胡害，其祸将大；毋曰胡伤，其祸将长。”这两处文字与《金人铭》第三段非常接近，有的甚至完全相同。

另外，《战国策·魏策》一载苏子引《周书》（以下简称《周》）曰：“绵绵不绝，漫漫奈何！毫毛不拔，将成斧柯。”《太公兵法》引《黄帝语》（以下简称《语》）曰：“涓涓不塞，将为江河；荧荧不救，炎炎奈何！两叶不去，将用斧柯。”《周》及《语》的文字与《金人铭》意思不但相同，用字也异常接近。

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？有三种可能：

第一，先有《金人铭》，而后其他各篇皆据而引之；

第二，无论《金人铭》，或其他四篇，都另有源头，分别有更早的出处；

第三，《席》等四篇分别先出，而后《金人铭》采纳综合成文。在这三种可能当中，黄方刚说：“三处文虽略异而义则相似，语气